

从徽商账本看太平天国战争前后 徽州地区的货币使用*

袁为鹏 龚 达

摘 要: 徽商同和号与兆成号的商业文书,蕴含清末徽州地区的货币行用方面的丰富信息。因商业发达,19世纪初以来外来银元已在徽州地区货币使用中占据相当优势。太平天国战争时期,徽州地区银两的使用曾一度回升,但战后随着地区经济的复苏和茶叶贸易的复兴,外国银元市场重新取得了绝对优势。这表明太平天国战争虽对地区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但徽州地区经济战后恢复迅猛。

关键词: 货币使用 太平天国战争 徽州

关于太平天国运动对于晚清社会经济活动的深远影响,学术界已有大量研究成果问世。^① 本文拟聚焦于徽州一地,利用徽州文书档案,以晚清徽商同和号与兆成号的商业账簿为主,利用账本所记录的相对连续而系统的交易信息,并结合其他契约文书史料,揭示19世纪中后期徽州地区货币使用结构变迁的情形,并藉此管窥太平天国运动对于当地社会经济的影响。本文还将结合徽州借贷文书以及北京商业契约文书,比较并讨论晚清城乡之间及南北两地货币使用结构的差异。

近年来,利用徽州地区的契约文书包括商业账本来研究徽州地区经济社会史的成果不断涌现,如吴秉坤利用黄山学院所藏的徽州文书,整理

出清至民国徽州民间借贷利率表。马勇虎利用徽商志成号的商业账簿进行了一系列的关于货币流通以及银钱比等问题的研究。刘秋根、孙丽等人依据徽商簿册对明清时期的商人合伙制度进行探讨。本文体现这一新的学术潮流,并在吸收和利用前人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学者提出的“银两始终在徽州的交易中占据相对于铜钱压倒性优势”的观点进行修正。^②

同和号与兆成号账簿概述

徽商同和号与兆成号账簿收录于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刘伯山主编的《徽州文书》第一辑之《黔县五都四图程氏文书》(以下简称《程氏文

* 本文受北京用友公益基金会“商的长城”重点项目“传统工商业账簿史料编目、整理与研究(1600—1949)”的支持。本文感谢宁君、商卓澄、简大伟、牛浩在数据辑录、整理方面的帮助!感谢刘伯山、吴秉坤、熊昌锷和彭凯翔提供的资料支持。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葛夫平、卞修跃、吴敏超等教授及中国近代货币运行规律学术研讨会(河北师范大学2018年7月)与会学者的建议。

- ① 余道年:《太平军在徽州活动状况及其对徽州宗族的冲击》,《皖西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李楠、林鑫:《太平天国战争对近代人口影响的再估计——基于历史自然实验的实证分析》,《经济学(季刊)》2015年第4期;邱飞:《太平天国时期宁波进出口贸易》,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
- ② 吴秉坤:《清至民国徽州民间借贷利率资料汇编及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马勇虎:《咸丰年间货币流通的民间形态——徽商志成号商业账簿研究》,《安徽史学》2011年第2期;岸本美绪:《清代中国的物价与经济波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321页;刘秋根、谢秀丽:《明清徽商工商业店铺合伙制形态——三种徽商帐簿的表面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3期;孙丽、袁为鹏:《晚清徽商的资本积累:兆成号盘单中的“堆金”与“财神堂”考释》,《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孙丽、袁为鹏:《论晚清徽商合伙经营之稳健性特征》,《安徽史学》2022年第4期。

书》)与《黔县一都榆村邱氏文书》(以下简称《邱氏文书》)。其中,《程氏文书》包含了同和号与兆成号抄录给其股东程鸣玉记的买卖租典契约、合同公约、收借条、账单账册等重要文件,记录有徽商经营状况、借贷利率、货币汇率等重要商业信息。《邱氏文书》中则包含了同和号与兆成号的另一位股东邱集文及其后代所保存分家的阉书,为考证这两家商号的源起兴衰提供了丰富信息。

《程氏文书》为刘伯山于1998年从黔县本地的一位商贩手中获得。^①经过刘伯山整理,这批文书共有270份,多为商业文书,并且还记录了程氏与黔县一都榆村邱氏的交往信息。《邱氏文书》共有280份,年代最早的一份可以追溯到天启四年(1624),最晚的一份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时间跨度为330年。这其中保存较好的有光绪十六年(1890)邱应书的遗嘱,其中记录了邱氏家族参与经营同和号与兆成号的详细过程。^②由此我们还得知同和号的股东程鸣玉记以及邱集文记都参与了后续兆成号的经营。据宾长初与汪崇笈考证,^③同和号的经营地点为安徽黔县碧阳镇,主营布业。兆成号的经营地点为休宁县屯溪。兆成号实际上是同和号难以为继以后,由股东们重新出资开设的,因此这两家商号的经营具有延续性,适宜放在一起进行研究分析。

这两家商号的文书,如账单、账本、收租簿、礼单、货单、支用单等,可分为三类:一是合墨,二是计抄与扎契单,三是盘单。合墨指合同,象征着商人经营活动的开始,是徽商出于自身经济利益,与合股的亲友或者不同宗族合伙人之间签订的协议文书。计抄与扎契单是商号流水出入的记载,在每年正月盘点时,商号对上一年度与某一商业往来对象的日常收支帐目的抄送。这类抄照单并不记载业务往来帐目,而是日常现金收支,主要由“收”“支”“结存”等三个项目构成。盘单是商号

股东对商号经营状态的年度盘查单据,可以理解为年度经营的决算报告。^④一般而言,每年正月为盘点时间,经营情况会被抄照给各投资者以供参考。同和号与兆成号的盘单类账簿,是本研究的主要关注对象,其按照存项与该项将账目分类的想法,大体类似于现代会计制度的资产负债表。除此之外,盘单还包含有关于银钱比以及货币使用的情况。

同和号与兆成号盘单的存项大体可以理解为商号的资产。具体分为:(1)存货,即记录本会计年内商号所存货物的价值。在盘单中不会详细记录商品的种类、单价等信息,只会记录它的作价,具体商品信息可能会记录于盘货单中。^⑤(2)预付账款,即字号因采购商品而预付给供应商的款项。(3)应收账款,即商号采用赊销方式销售商品,形成一项应该收取的权利,即应该收取但还未收到的一笔货款。(4)店友暂欠,即店友伙计从商号支取的款项,可理解为商号对自身员工的债权。此外,在兆成号的一些盘单中,曾列有字号付给屯溪益泰亨号的押金,还有付给当地行会的会费,这也可以认为是债权的一部分。(5)固定资产,大多体现为商号置办的装潢与家具,会不定期地列入存项中并进行某种类类似于折旧的处理,在兆成号经营的后期,还出现有古董等项目的记载。(6)现金项,这是指盘点时,商号现存各类货币的实际数额。

而盘单的该项,结构相对简单,其中有些就是购买商品的客户预付款,有些则指商号的欠款,在个别年份还出现了对长工工资的拖欠,即应付职工薪酬。在每一年的盘单中,都会进行“除该各存仍存……”的总结,是将“存项”扣除“该项”后的盈余,可以理解为商号所有者享有的剩余权益。

在盘单的最后,商号依据当年的剩余权益与各股东的股本,确定当年分红的比率和每位股东

① 刘伯山:《徽州文书》(第一辑)卷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页。

② 刘伯山:《徽州文书》(第一辑)卷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9—200页。

③ 宾长初、汪崇笈:《清代徽商资本诸问题探析——以〈徽州文书〉第一辑为依据》,《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④ 马勇虎、李琳琦:《晚清徽商合伙经营实态研究——以徽商商业文书为中心的考察》,《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

⑤ 汪崇笈:《清代徽商合墨及盘、帐单——以〈徽州文书〉第一辑为中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4期。

应得份额。之所以不约定投资者按某个固定比率获利,可能是为激励投资者积极参与商号的经营活动,并使其对经营表现负责。^①另一方面的考虑应该是为了减轻商号的经营压力,小规模商业经营十分容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干扰,如果商号在某年经营困难,亏损严重,却还不得不给股东大量分红,无疑是雪上加霜。^②

此外,同和号与兆成号的盘单中,有大量关于19世纪后半期银钱比价的记录,主要有两大来源。一是同和号与兆成号现金项中留存铜钱的记载。二是“存项”或“该项”中使用铜钱结算的换算记录。同和号与兆成号对于银钱比价的记录从道光二十九年(1849)一直持续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时间跨度50年左右,期间有一些年份没有记载银钱比价的资料。

徽州文书中记录的货币使用

在清朝最初的一百年里,国内大部分使用银的交易都以银块或银锭作为媒介,以“两”为单位计价。进入19世纪,外国银元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深入中国内地,大有逐渐替代银两的趋势。到了清末的几十年,清政府开始铸造发行自己的银元,市场上同时流通着传统银两、外国银元以及自铸银元等货币。^③

同和号与兆成号的经营时长跨越了半个世纪左右,其账簿中出现的诸多交易也见证了清朝自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再到新政改革等重要阶段有关以“银”“铜”为介质的货币信息,现对文书中记录的各种货币使用情况进行考察。

关于传统银两的使用,在兆成号光绪二十三

年(1897年)正月初二的盘单中,就有如下记载:

该胡蔚记二四曹宝文一千四百五十七两一钱八分二厘

该邱计集计二四曹文三十两一钱二分二厘

在兆成号这两笔“该项”的记录中,使用的计价货币是二四曹宝纹银,事实上,在同和号与兆成号账簿中出现的绝大部分与银两有关的交易,使用的都是二四曹宝纹银。关于“曹”的含义,很有可能是对于计重单位“两”的规范。清朝关于“两”的计量衡也没有统一,许多地方都有自己独特的计量标准——“平”。不过,在众多不同的计量标准之中,最为重要的是库平两、海关两、广平两和漕平两这四种。^④据戴建兵考证,安徽安庆所用的市平即为“漕平”,^⑤因此“二四曹宝纹银”中的“曹”应该就是指“漕平两”。关于“纹”的含义,则很可能指“纹银”,是一种全国性的假想标准银,成色是千分之九三五点三七四,实际上并不存在,只是一种换算单位。^⑥由于银两的种类繁多,计量衡不统一,因此在流通时十分繁琐。本埠所铸银两或外地运来银两由本地炉房改铸而成的,需有公估局鉴定,批准后,方可流通,“市面设有公估局,凡行用银两,持赴该局,即用漕平秤码平其分量”。^⑦

银两不仅在本地流通较为繁琐,异地之间,由于各地公估局的标准不同,流通更为困难。^⑧如果交易使用的是散碎银两,要对各种不同成色的银子以及秤平进行换算,极大增加了交易成本。这也使得普通人在交易时,更愿意用钱,而随着标准化的外国银元流入内地,大宗交易使用银两的频率也下降了。

① 汪崇策:《清代徽商合墨及盘、帐单——以〈徽州文书〉第一辑为中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4期。

② 关于这些盘单的会计史价值及其反映的晚清合伙制度的特征,请参阅孙丽、袁为鹏:《晚清徽商的资本积累:兆成号盘单中的“堆金”与“财神堂”考释》,《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孙丽、袁为鹏:《论晚清徽商合伙经营之稳健性特征》,《安徽史学》2022年第4期。兹不多述。

③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575页。

④ 注:库平两为全国纳税的标准秤;海关两适用于海关进出口货物税的支付和支出;广平两为广东省的计量衡;漕平两则使用于与漕运有关的商贸活动,多应用于江苏、浙江、安徽、上海等运河沿途省份。参见千家驹:《中国货币演变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76页。

⑤ 戴建兵:《中国近代银两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8页。

⑥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576页。

⑦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592页。

⑧ 戴建兵:《中国近代银两史》,第234页。

16世纪中后期外国银元随着海外贸易流入中国。^① 鸦片战争后,在中国流通较为广泛的银元,是西班牙本洋与墨西哥鹰洋。在同和号与兆成号的账簿中,本洋与鹰洋也是经常出现的货币。仍以光绪二十三年(1897)兆成盘单为例:

该孙和记本洋八十九元八角九分二厘,
九二扣曹文八十二两七钱零六厘

鹰洋一百九十二元二角九分七厘,七六
扣曹文一百四十六两一钱四分一厘

由此可知,这一年兆成号拖欠了孙和计近九十元本洋和近二百元鹰洋。此外,我们还可以知道,该年本洋与二四曹宝纹银的汇率是1:0.92,鹰洋与二四曹宝纹银的汇率是1:0.76。

由于外国银元制式统一便于流通,中国民间很早就开始仿铸银元。嘉庆年间曾出现过以本洋为模板的民间洋元,但是成色花纹不统一,贬值很快,终被禁止。^② 林则徐在任江苏巡抚时,曾在奏折中提到嘉庆、道光年间江苏民间已经开始铸造银元。同时,林则徐还提出铸造重五钱的道光通宝银元的设想,但是并未实行。^③ 光绪十三年(1887),两广总督张之洞提出应该自铸货币,从某种程度上抵制已经随处可见的外国银元。两年后,广东设厂,开始铸币。币面中央印有光绪元宝字样,背面刻有蟠龙花纹及英文,是清政府最早发行的制式银元。由于每元等于库平七钱三分,被称作七三番板,又被称作“龙洋”。^④

自铸货币,除了能够稳定中央政权对金融市场的控制,减少外国银元套利银两带来的白银外流之外,对于地方官员而言,也可以增加财政收入,稳固自己的势力。随着直隶、南京等地纷纷开铸龙洋,刚刚上任的安徽巡抚邓华熙向朝廷上疏:“安徽制钱缺乏,请仿广东湖北,筹铸大小银元,以济钱荒,而挽外溢之利。”不久之后,安徽就在

安庆东城火药库旧址之上设立银元局,开始铸造龙洋。^⑤ 但各省的银元局彼此之间相互独立,所铸银元重量成色仍然不统一,省际间的流通依旧困难重重。

龙洋的基本计价单位是元,币值较大,因此又有五角、二角、一角和五分的银辅币出现。^⑥ 由于种种原因,龙洋出现后并没有取代外国银元在市场中的地位,而是与它们一起流通。光绪二十三年(1897),兆成号的盘单中第一次出现关于龙洋的记载:

存现鹰洋三百五十一元,现钱龙洋五块,
六扣曹文二百十两六钱

这一年的现金项中同时记录了鹰洋与龙洋,并将它们按照1:0.6的汇率折成了二四曹宝纹银210.6两。可是当用银两除以汇率逆推后发现,210.6两白银等于351元,刚好是鹰洋的数量。因此可知,当年兆成号虽然在现金中结余了五元龙洋,但是并没有将它算入自己的资本,这可能是因为龙洋刚刚进入徽州,商人不知汇率,便出于保守考虑没有计价。也有可能是因为龙洋本身的信誉较差,被商人当作了“坏账”处理。

关于晚清外国银元、本土银两与铜钱的使用情况,较少有系统性数据,大多信息散落于各种笔记之中。根据郑光祖在《一斑录》中的记载,^⑦ 乾隆四十年(1775)左右,西班牙本洋只能兑换铜钱七百余文。由于外国银元携带方便,使用频率越来越高,价格也随之上涨。至道光二年(1822),外国银元与铜钱的兑换比价为一元兑换九百文,这引起了朝廷的警惕。清政府认为含银量较低的银元,价格却很高,给了外国商人很大的套利空间,因此决心在苏州、常州等地禁止银元流通。然市场对于银元非常喜爱,一旦禁令出现松动,银元价格又得以恢复并且持续增长。到道光二十年

① 沙丁、杨典求:《中国和拉丁美洲的早期贸易关系》,《历史研究》1984年第4期。

②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581页。

③ 千家驹:《中国货币演变史》,第186页。

④ 《清碑类钞》中记载了广东在发行龙洋后,商贸方式发生的改变,参见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679页。

⑤ 李标:《晚清安徽财政变革研究》,安徽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第45页。

⑥ 千家驹:《中国货币演变史》,第191页。

⑦ 参见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51页。

(1840),一两纹银可以兑换一千五六百文左右的铜钱,而银元则可以兑换一千一二百文左右的铜钱。银元初入中国市场时,人们对其比较陌生,所以价格较低。随着银元在中国的普及,外国银元兑银两的升水也渐渐消失。即使在官府禁止银元流通一段时间后,它又一次成为市场的宠儿。

如前文介绍,同和号与兆成号的资产项,大致可以分为应收及预付款项、存货、现金以及资本公积等项。其中,留存的现金以银两(二四曹宝纹银)、银元(鹰洋、本洋)、铜钱为主,从光绪二十三年(1897)开始,大量出现如刀铜、龙洋、角子、小洋等其他货币。如在同治九年(1870)正月初二日的盘单中,兆成号对现金项目的记录是:

存现曹宝纹,一百十五两七钱四分
存现洋七百二十一元,七折扣曹宝纹五百零四两七钱
存现钱八千四百五十文,作曹宝纹四两九钱四分

由此可知,商号对现金的类别有清晰的区分,并且已经换算成统一的货币单位,其中同和号使用银元进行记账,兆成号使用银两(二四曹宝纹银)进行记账。因此,通过分析盘单中现金项目的货币构成以及其随时间变化的趋势,可以描绘出这两家商号的货币使用偏好。尽管同和号与兆成号的股东有很大重叠,但是它们的经营规模大相径庭,因此如果将两家商号各种货币的币值总量放在同一条时间线上比较,并不合适。由于两家商号地理位置距离很近,受地理、气候、战争、汇率等外部因素异质性影响较小,因此使用货币比例作为指标,将两家商号置于同一时间线进行比较。

现有盘单资料的时间跨度从道光二十九年(1849)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通过对账簿现金项的整理,可以得出每一年商号留存现金的数量、类别以及各种货币的占比。现利用整理出的数据绘制出每一年度现金结构柱状图以及变化趋势,见图1。

图1可看出,在最初的五年内,商号留存的现金绝大多数以银元为主,咸丰四年(1854)出现一次波动后又回归到外国银元主导的地位。但是从1857年开始,银两的使用比例一下攀升到43%,

同治年中(1866—1873),银两在现金中的留存依然占据较高比例。随后在光绪十二年(1886),银两的比例降到23.2%,而在光绪十四年(1888)以后,商号的现金中再也难觅银两的身影,外国银元正式开始占据市场。从光绪二十六年(1900)开始,自主发行的货币如龙洋、角子等开始大量出现,成为了外国银元的有效补充,但是在盘单的存项与该项中,仍然很少出现使用这些自铸银元结算的交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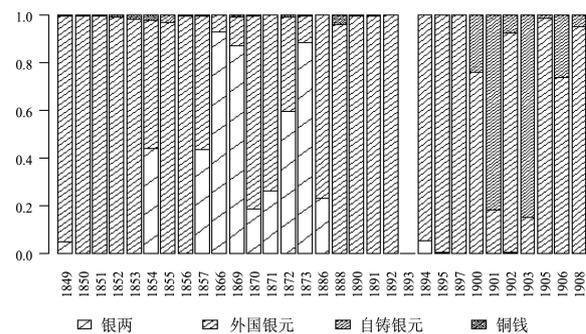


图1 同和号与兆成号的货币使用

资料来源:刘伯山:《徽州文书》(第一辑)卷一、卷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说明:兆成号光绪十九年(1893)的盘单中尽管有留存现金鹰洋两元一角、本洋五元、铜钱五百四十八文,但都作不计价处理,因此现金数据为零。

由于币值的关系,尽管同和号或兆成号每年都会结余一些铜钱,但是在最终换算后,钱不会占据太高比例。铜钱占比最高的年份是光绪十三年(1888),达到了总现金币值的4.22%。而更多的时候,这些结余的铜钱都作不计价处理。由此可见,在徽商的交易中,银两或银元是主要的交易货币与结算货币,铜钱处于辅助地位,用于支付小宗商品或廉价劳力。

为什么徽商对银元的偏爱会在19世纪中叶发生了一个突变并且持续十余年之久,又是什么导致了在19世纪70年代后,银元的使用又回归了主导,这是下文需要讨论的问题。

货币结构变化的原因以及与外省的比较

尽管清朝白银和铜钱并行流通,但在清初期,货币的使用以银两为主,政府也大力提倡,在官方

记账与税收中都使用银两。^① 在民间,大额交易多使用银两,小额交易一般使用铜钱。直到嘉庆年间,海禁渐开,被贸易以及高利率吸引来的外国银元才开始大量深入中国内陆。进入道光年间,从传统贸易口岸广东、福建,到黄河以南,都有大量银元流通。不仅在民间,南方各省在缴税时都倾向使用银元。^②

银元的增长势头一直保持到清末民初。据统计,清末外国银元在华流通或者随时可投入流通的币值超过5亿元。^③ 据彭信威估计,外国银元占清末全部货币供应的30%,而美国学者郝延平的估算则达到47.8%。此消彼长,标准化流程制造出的外国银元在成色、重量方面能够实现统一,极大提高了交易效率,降低交易成本。而传统的银两在使用时需要经过一系列繁琐的鉴定流程,要被送到公估局“较银色之高低”“称分两之轻重”,方可进行交易,因此从晚清开始,对于银两的使用愈发减少。^④

除受到银元挤压的影响,中央政府和省政府对待银两的态度也发生改变。为与强势的外国银元抗衡,清朝官员积极倡议由清廷自铸银元,原因有五:(1)中国需要一种能与内外贸易相适应的币制,来刺激洋务产业发展。(2)改革币制以维护主权,摆脱西洋的金融垄断。(3)银元使用较银两更为方便。(4)铸造自主发行的货币有利于统一日渐繁杂的货币市场。(5)通过鼓励地方与民间铸造银币,来解决清政府自身的财政困难。^⑤ 甲午战争过后,从官方到舆论都对自铸货币极为热情,全国多地开始设厂鼓铸银元。为支持张之洞在广东省铸币,善后局专门拨给纹银用作原料。

而上海在铸造过程中,也大量使用了从四川、湖南、江西、天津、东北等地流入的银锭。^⑥ 1840—1911年,外国银元市场份额达到43.4%,银锭、铜钱之和为29%,自铸银元占到9.6%。^⑦ 在外国银元强势入侵与清廷货币制度的转变中,中国货币市场占据千年主导地位的银两逐渐衰退,民国的“废两改元”运动后,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根据林满红的研究,银元多在经济富裕程度较高、商品需求旺盛的地区流通,而银两则多在内陆省份或距离主要港口与交通动脉超过走路两天可到的距离以上的地方。^⑧ 按照这个划分,在芜湖租界开辟之前,徽州距离上海或宁波等通商口岸都较远,较之长江出海口的地区要欠发达一些,然而徽州又比内陆或北方各省更加“开放”,受外贸影响更大,因此徽州应该属于银元、银两同时流通的地区。岸本美绪通过分析清代中国各地不动产买卖契约中使用的货币种类,描绘出中国多个地区使用银两、银元、铜钱以及其他物品作为交易货币的变化情况,其所使用的资料分布广泛,包含了苏州、北京、曲阜、徽州、闽南、台湾等地的土地买卖文书,时间跨度从17世纪到20世纪初。研究表明,到18世纪中叶为止,在全国各地银两的使用都占据了较为主流的地位,在这之后,从银两向外国银元的转换非常明显,并且铜钱数量也增加了。^⑨

前人的定性研究充分描绘了清末时期银两与银元行用比例的消长,彭凯翔则基于吴秉坤整理出的二千余笔清至民国徽州民间借贷利率以及计价货币的数据,绘制出了徽州明清货币结构变化

①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575页。

② 1829年,道光皇帝给军机大臣的上谕中提及:“……黄河以南各省洋钱盛行,凡完纳钱粮及商贾交易,无一不用洋钱”(参阅林满红:《银线:19世纪的世界与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9页)。

③ 张宁:《清代后期的外币流通》,《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2年第3期。

④ 民国编写的地方志中可见详细记载:“自光绪庚子后,银元行使,颇觉便利,而银块于无形中即消失”,“光绪中叶,国家改铸银币,辅以铜元,而宝银、排银日少”(参阅戴建兵:《中国近代银两史》,第84页)。

⑤ 千家驹:《中国货币演变史》,第185页。

⑥ 戴建兵:《中国近代银两史》,第85页。

⑦ 熊昌锐:《良币胜出:银元在近代中国市场上主币地位的确立》,《中国经济史研究》2018年第6期。

⑧ 林满红:《银线:十九世纪的世界与中国》,第41页。

⑨ 岸本美绪:《清代中国的物价与经济波动》,第319—328页。

的趋势图。^① 他的研究指出,18世纪中前期,货币使用中银两占绝对主导,此后随着铜钱供应的稳定增长,主导地位逐渐为铜钱所夺。然而从19世纪开始,大量外国银元流入江南,银元的使用开始呈现上升趋势,到1850年以后,太平天国战争的冲击一度使国内币制紊乱,外国银元凭借其质量与供应上的优势,在国内币制市场开始占据主导地位,而银两的使用则逐渐淡出。此图与图1所反映的货币结构变化趋势大体一致,可以证明在19世纪后,徽州地区流通的外国银元取代银两,成为主要交易货币。但是图1中出现的银两占比回弹的情况却没有在此图中有所反应,这可能是因为此图的年份坐标是每20年设一节点,很容易忽视20年中重大历史事件对货币结构的冲击。马勇虎在对徽州志成号文书的研究中,也发现了与同和号与兆成号类似的规律。从咸丰元年(1851)至咸丰六年(1856),交易中洋元兑换铜钱次数分别为银两兑换铜钱次数的8倍、3倍、3倍、2倍、5倍、3倍,^②这更进一步佐证了徽州商号对银元使用愈发频繁的发现。但是志成号的数据仅截止至咸丰六年(1856),并未记录1857年以后对银两的使用情况。同和号与兆成号的数据也仅仅只是告诉我们银两又在1857年出现在人们视野中,在之后的十年里,徽州地区的货币结构变化趋势到底有没有出现起伏?如果这段时间内外国银元的使用下降了,其原因又是什么?我们可以先通过梳理史料,从中找到线索。

事实上,外国银元使用下降的情况在顺治朝就出现过。1650年,清朝各省普遍使用银元,然而随着1659年开始的近三十年的海禁政策,外国银元的使用几乎绝迹。^③ 因此,不难想象,如果1857年后的银元使用出现下降,是由于当时的某个重大历史事件引起的。

爆发于咸丰元年(1851)的太平天国运动波及了广东、浙江、江苏、福建、江西、湖南、湖北以及安徽等南方各省。1854年,由于太平军北伐失败,湖北、安徽、江西等省成为太平军与清军及曾国藩所率湘军持续了近十年冲突的主要战场。^④ 因此,徽州长期处于太平军和清军及地方团练的反复争夺与烧掠中。咸丰四年(1854),太平军由祁门县正式入徽州,战事十分激烈,祁门知县唐治和大洪司巡检钟普塘在与太平军交战时战死。^⑤ 而同和号所在的黔县与祁门县相邻,可以想见此时黔县境内也发生了不小冲突。据《太平军兵争期内皖省府州县经过兵事年月表》统计,徽州六县中,黟县和绩溪县被太平军占领过各15次,祁门县和婺源县各11次,休宁县10次,歙县4次。^⑥ 兆成号所在地屯溪于同治三年(1864)遭到过这样一次袭击。^⑦ 由于战争激烈,徽州人口在战后数十年里都呈现出“半真空”的状态,因此吸引了大批外来移民。随着人口锐减,徽州的宗族体系以及保甲里社制度遭受重创,很多徽商家族从此一蹶不振。^⑧ 我们或许可以猜测,太平天国战争极可能阻断了1857年后徽州的对外贸易,从而使得徽州流通的银元减少,日渐消失于徽州商贸交易中的银两出现回弹。

然而事实上,尽管战乱在徽州蔓延,太平天国无论从政治方针还是军事行动上,似乎都不愿意与西方产生太多摩擦。这一时期的对外贸易停滞是由于太平天国对外政策导致的长时期彻底中断,还是由于战乱冲击而导致的短暂中断,依然需要进一步探讨。

在太平天国运动初期,他们所宣扬的基督教信仰博得了西方一定的同情。建都南京后,即向外国人表示:“天下本一家,四海皆兄弟也。”极力

① 彭凯翔:《从借贷契约看清至民国时期徽州的民间借贷与民间经济》,载吴秉坤:《清至民国徽州民间借贷利率资料汇编及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序二”,第4页。

② 马勇虎:《咸丰年间货币流通的民间形态——徽商志成号商业账簿研究》,《安徽史学》2011年第2期。

③ 林满红:《银线:19世纪的世界与中国》,第37页。

④ 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83页。

⑤ 许承尧:《歙事闲谈》,黄山出版社2001年版。

⑥ 余道年:《太平军在徽州活动状况及其对徽州宗族的冲击》,《皖西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

⑦ 余道年:《太平军在徽州的活动状况及其对民众生活的影响——对〈介夫年谱〉的分析》,《大庆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

⑧ 李楠、林鑫:《太平天国战争对近代人口影响的再估计——基于历史自然实验的实证分析》,《经济学(季刊)》2015年第4期。

欢迎外国人来中国进行贸易。^① 外国商人也期望自己在太平天国占领区的业务不会为战争影响,因此西方政府对南京进行过多次外交试探。^② 1853年4月,英国驻香港总督文翰(Samuel George Bonham)得到东王杨秀清与北王韦昌辉的接见,他们的致函中解释了英国中立的立场,并且希望太平天国能够承认英国的条约权利。杨秀清也明确地告诉文翰:“准尔英酋带尔英民自由出入,随意进退,无论协助我天兵歼妖敌或照常经营商业,悉听其便。”从后来西方各国宣布在太平天国与清政府直接保持中立的做法来看,西方对太平天国运动的担忧并不主要源于对其政权本身的不信任,而是担心战乱会使得农村与商业陷入混乱,从而威胁在中国贸易。^③ 从对外政策上,太平天国政权并没有主动破坏外贸的动机。

从茶叶出口的角度,或许可以为我们来探寻太平天国战争对徽州对外贸易的影响到底是长期性还是短期性提供新的线索。徽州自唐代以来就是茶叶的主产区,在五口通商之后,嗅觉极为敏感的徽商就立即抓住机会,试图与西方建立茶叶贸易。比如在道光二十四年(1844)徽宁思恭堂的募捐启事中有:“当与外洋通商之际,又得吾乡茶商诸君云集而至。”还有些徽州茶商,及早就意识到上海在外贸中地位将超越广州,将业务迁至沪江。^④

徽州茶叶出口的交易链条中,在供货端茶农与需求端洋行之间,还有作为采购商的茶号以及与洋行接触的茶栈,或称洋庄。茶栈的总部一般位于上海,通过设于屯溪的分栈进行茶叶收购或放款等业务。^⑤ 我们由此可以勾画出在长江内河

通商之前,外国银元流入徽州的路线:通过与外国商人交易茶叶或丝绸等商品,洋行获得银元,而后随着茶栈、茶号的层层交易,银元流入徽州,逐渐成为各大商号业务往来的结算货币。^⑥ 由这条线索可以看出,如果徽州银元的使用减少,对外贸易数量下降,必然与茶叶的供货端、中间商或是需求端的变化有紧密联系。

连年的战乱对茶叶的供货端,即茶农以及茶号,产生了很大影响,但战争对徽州的茶农与茶号带来的打击并不一定是毁灭性的,他们可以在十年左右的时间内就恢复生产经营。^⑦ 此外,战争对中间商的商品运输会造成直接影响,而在徽州茶叶贸易的出关阶段,受到战争的影响就较小了。与此同时,国际市场上,也出现了对于徽州茶叶的利好。1860年后,世界银产量逐渐回升,这从某种程度上刺激了国际市场对于茶叶的需求。^⑧ 中国茶叶与生丝的出口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大幅增长,这使得在1857年到1886年间,共有6.91亿银元流入中国。由于徽州是中国的主要茶叶产区,因此有相当一部分银元会重新进入徽州。

因此,徽州的贸易在受到冲击后,很快就能重新启动。或许贸易完全恢复需要几十年的时间,但这期间绝不是“商旅不行”的状态。银两的使用可能会由于太平天国战争的冲击出现回弹,外国银元也有可能随着徽州对外贸易的复兴重新在徽州市场占据主导地位。由于同和号与兆成号的数据中断于1858年,随后十年的数据都是缺失的,因此我们需要其他的资料来补充这一时期的货币使用情况。

① 邱飞:《太平天国时期宁波进出口贸易》,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20页。

②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37页。

③ 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第292页。

④ 冯剑辉:《近代徽商研究》,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5页。

⑤ 冯剑辉:《近代徽商研究》,第69页。

⑥ “日益增加的大量银元,逐渐流入(上海)临近的产丝区和绿茶产区”(参见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58页)。

⑦ 如名茶“黄山毛峰”创始人谢正安家族于宣统二年(1910)所立的阉书中,就记载了徽州茶叶商人在太平天国战争中所受的冲击。咸同战乱时,“粤匪窜徽,家业为之荡尽……适时势稍平而天灾病疫……孑然寡助之时,处家无立锥之地,自磋命蹇莫迥,既倒之波澜恐添所生,誓欲重撑夫门户。”受战乱与病疫的影响,谢氏家族受到了巨大冲击,商人谢正安发誓要重振家产。他们的机遇很快到来,同治四年(1865)以后,徽州的商贸便开始复苏,谢正安趁此机会,将家族的茶叶产业重新壮大(参见张斌:《关于“黄山毛峰”创始人谢正安家族的两份阉书》,《黄山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⑧ 林满红:《银线:19世纪的世界与中国》,第265页。

如前文所述,彭凯翔使用吴秉坤整理出的二千余清至民国徽州民间借贷利率以及计价货币的数据,绘制出了明清货币结构变化的趋势图,但是由于其年代划分为20年一间隔,很难清晰显示出某一特定历史事件带来的影响。因此,我们使用同样的资料,将其变成年度数据,绘示1860年前后徽州货币使用情况,并将其与同和号与兆成号进行对比。

吴秉坤的数据来源于黄山学院图书馆徽州文化研究资料中心所藏的徽州借贷文书,含有借贷发生年份、地点、利率和所借货币的种类、成色和数量等诸多变量。其中,1848年到1879年,共收录文书494件,在同和号与兆成号数据缺失的1858年到1866年,共有文书160件,样本量足够丰富。因此,由吴的数据得出的结果较为可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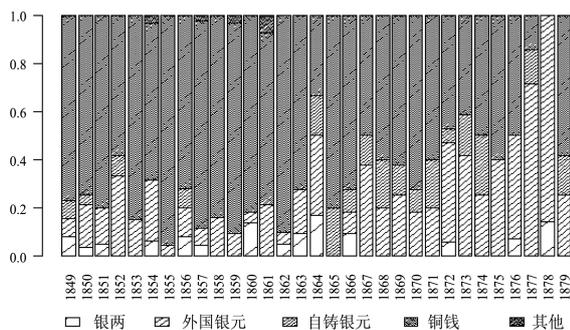


图2 徽州借贷文书中的货币使用

数据来源:吴秉坤:《清至民国徽州民间借贷利率资料汇编及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251页。

图2反映了在1849年至1879年,徽州货币结构的变化。本文将所有借贷数量按年度加总,进而算得借贷中使用的每一种货币占当年总借贷数量的比例,以此作为当年徽州货币使用情况的反映。因为这批借贷契约的来源既有城镇,也有乡村,并且以乡村为主,因此铜钱的使用占据了大幅比例,这与中国农村长久以来使用铜钱作为结算货币的常识一致,并且本文的发现也对有学者认为的“银两始终在徽州的交易中占据相对于铜钱压倒性优势”的观点提出了质疑。^①

图3则重点考察了外国银元、自铸银元相对于银两使用情况的变化。可以看出,在1855年之前,银元的使用占据较大比重。而在1856年与1857年,银两的使用出现回弹,这与同和号以及兆成号的账本资料是一致的。在1857年以后的几年,有些年份中银元完全占据市场主导,而有些年份银两能够占到约三分之一的比例,但是市场上对银两的使用始终都未超过对银元的使用。这说明太平天国战争对于徽州货币结构以及外贸的影响开始于1856年左右,于1857年影响加剧。在随后的几年中,由于时有战乱或疫情发生,外贸时常受阻,但是一旦局势稳定,无论清政府还是太平天国都不会主动干涉徽州的对外商贸,外贸很快恢复。1866年后,战乱留下的紊乱币制让银元对银两的优势更加明显,促进了银元主导地位的形成。^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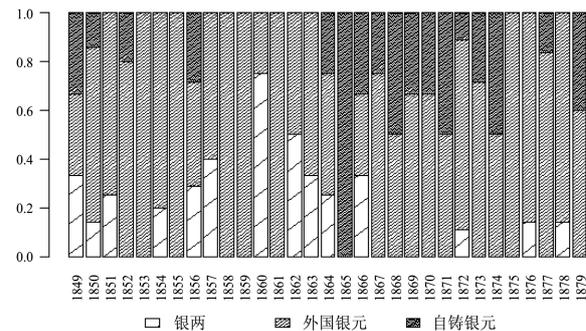


图3 徽州借贷文书中的外国银元、自铸银元与银两使用

数据来源:同图2。

值得注意的是,战争对徽州市场货币结构的影响为什么在太平军进入徽州两年以后才产生?一种可能是因为1854年太平军的战事刚刚进入徽州,影响只是局部的。另一个可能是因为徽州市场上的银元存量很大,银元流入的减少需要在外贸中断后一到两年的时间才体现出来。

1856年4月19日的北华捷报给银元减少的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当时太平军带来的恐怖和灾难遍及华中与华北,真是到处血流成河,庐舍为墟。那时,一方面,胆战心惊的人急

① 岸本美绪认为:“18世纪中叶前后,尽管江南等地是铜钱使用的活跃期,但是在徽州却几乎不使用铜钱,甚至小买卖都使用银。在此后五十年左右,徽州才开始普及使用铜钱,但是在实际交易中,银两的使用始终占据压倒性的优势”(参见岸本美绪:《清代中国的物价与经济波动》,第321页)。

② 王业键:《中国近代货币与银行的演进(1644—1937)》,台湾“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81年版,第44页。

于求得银元,因为它是代表众所公认的一定价值的最方便的形式,而被秘密的收藏,供将来使用……另一方面,除了鸦片以外各种进口货的销售,几乎都陷入停滞,导致英镑的汇率达到空前的高度……”^①熊昌铨发现,这一期间银元对英汇率上升到5先令7便士至7先令9便士,平均价值提高了25%至30%。^②

王宏斌对太平天国时期银价下落的研究可以让我们对这一变化过程有更全面的了解。为筹集军费举办团练,各地官绅不得不把贮藏的大量银锭强行注入市场,这一方面造成了银价下跌,也使得银两的流通量上升。^③这样看来,除了贸易停滞这个原因以外,劣币驱逐良币现象也在当时的徽州发生了。在战乱下,人们普遍愿意储存不需要“公估”、币值更稳定的“良币”——外国银元作为不时之需。而之前逐渐消失,成色相对较难以鉴定的银两,则作为“劣币”在此时又重新回到人们的视线中。而且战时,湘军淮军的饷银也有可能是户部拨来或各省协济的银两,清政府的财政支出仍以银两为主,大量军费在江浙皖赣地区使用,加强了银两在战时货币使用的比例。

1856年,外汇市场的变动也可能是导致这一时期货币结构变化的原因。这一年,西班牙银元的价格由英镑6先令2便士上升到7先令8便士,而纹银却下降了20%。含银量比纹银少11%的西班牙银元却可以与纹银等值交换,这使得内地大量的银元都涌入上海,交换银两进行套利,内地流通的银元也因此减少。^④这种套利行为在汇价下跌、银价上涨、西班牙银元与银两的换算率恢复到原有水平后就会停止,其影响时间较短,并且参与投机的银元数量是否庞大到足以影响货币结构,是需要进一步考证的问题。

通过对比同和号、兆成号账本中的数据 and 吴秉坤所录民间借贷的数据,还可以发现当地在银

两与银元行用中值得注意细节。比如,在图1中,1849年银两的使用比例仅为4%,银元行用占比超过90%。在图2中,1849年银两与银元(包括外国银元与自铸银元)的行用所占比例大致相当,各占约10%,而在1850年以后银元的使用才占据较之银两占据压倒性优势。这很可能是19世纪40年代以前白银外流和银贵钱贱危机的体现。^⑤至于为何这两组数据在银两银元比例的数值上会有较大的差距,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基于吴秉坤借贷契约得到的比例是较大样本计算结果,比较稳定,更能反应市场整体的情况。而同和号与兆成号只是个体商铺的数据,更易受商铺自身经营状况影响,稳定性较差。更为重要的是,吴秉坤的借贷契约涵盖了许多乡村地区,这些地区更多地保留了使用银两的习惯,而同和号与兆成号数据则更大程度上反映了在县城经营的商号或商铺货币使用情形。因此在同一年的情况下,总是能看到吴氏数据反映的银两比例多于同和号与兆成号的银两比例。对比二者的趋势,可以发现使用银元银两的变化基本是一致的:一方面,19世纪后半期徽州市场货币行用习惯均发生了显著的由银两向银元转变的过程,但这一转变过程在太平天国时期均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干扰和破坏,但这一市场趋势在战后不久即得以恢复。

前人的研究成果也印证了我们对太平天国战争影响徽州贸易程度的判断。林满红认为太平天国虽然波及了中国主要产丝与茶叶的东南地区,然而实际上这些经济作物的贸易并没有被太平天国战争摧毁。^⑥需要说明的是,岸本美绪认为,在徽州地区,银两始终在货币流通中占据优势地位,^⑦这与本研究的结果有些矛盾。原因之一可能是岸本美绪使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徽州土地买卖文书,这些交易大多发生在农村地区,银元本来稀少,加之土地买卖属于大宗交易,不太可能使用

①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58页。

② 熊昌铨:《良币胜出:银元在近代中国市场上主币地位的确立》,《中国经济史研究》2018年第6期。

③ 王宏斌:《论太平天国时期银价下落问题》,《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6期。

④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63页。

⑤ 林满红:《银线:19世纪的世界与中国》,第91页。

⑥ 林满红:《银线:19世纪的世界与中国》,第91页。

⑦ 岸本美绪:《清代中国的物价与经济波动》,第328页。

铜钱支付,因此这样的交易肯定使用银两多过银元。在其1843年到1913年的数据中,可以明显看到使用银元的交易大量出现,这与本研究发现在19世纪50年代后银元在货币市场上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结论相吻合。原因之二可能是岸本美绪的样本来源更广泛,而吴秉坤的数据更多集中在茶产地。熊昌锷的研究发现,由于茶商向产茶地区的农民购买茶叶,茶叶产地使用银元的契约数量明显多于非产茶区,毗邻港口或沿海的城镇、农村也更偏好银洋。不过在丝、茶产地以外的农村地区,受制于交通条件以及地丁银等税赋多以钱折银缴纳的原因,银锭和制钱的使用远超银元。^①

尽管银元在清末徽州地区的流通已经十分普遍,但是在北方地区却是另外一番景象。本文使用刘小萌主编的《北京商业契书集》中收录的200份交易记录,采用同样的方法对北京地区的货币使用情况进行分析。这些契书按种类分为典契、卖契、铺底契、合伙经营契,时间跨度从道光元年(1821)到宣统二年(1910),由于数据量较小,因此时间上采用每5年为一时期进行统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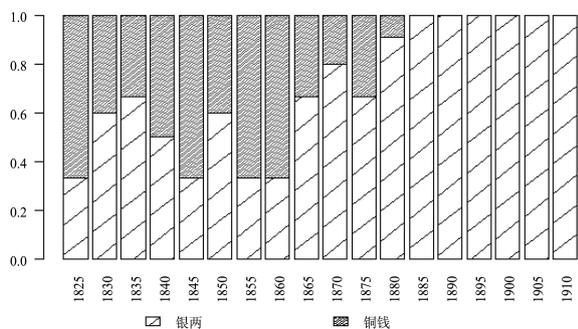


图4 北京地区的货币使用

数据来源:刘小萌:《北京商业契书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版,第410—428页。

可以发现,在清末北方的货币使用中,几乎不见银元的踪影,只有银两与铜钱被用于交易。在进入民国时期以后,银元才逐渐出现。^②这一发现印证了北方多使用银两,南方多使用银元的观点。而关注银两相对与铜钱使用的变化,在1865

年以后,原本占据半壁江山的铜钱逐渐减少,在1885年以后就销声匿迹了。对比徽州的铜钱使用情况可以看到相似的规律,1865年成为了铜钱使用的转折点,外国银元与自铸造银元的使用越来越多。这说明银铜二元本位下中国货币体系的变化是全国性的,银、铜价格,对外贸易、市场偏好、货币政策会对南方、北方的铜钱使用造成相似的影响。

余 论

民间文书中蕴含的丰富信息可以为我们提供翔实的微观史料与数据,帮助我们进一步探明清代中国社会经济面貌。本研究利用同和号与兆成号的账簿中现金货币留存比例、徽州民间借贷资料以及北京商业契书等资料,讨论了晚清货币结构的变化。总体趋势而言,外国银元在逐步取代传统银两。但是太平天国战争带来的外贸中断使得银两开始在市场上回归,这种回归一是因为银元流入减少,二是因为战争导致的反弹,并未持续很久。由于徽州茶叶贸易的体量庞大以及太平天国本身对于外贸的鼓励态度,徽州的对外贸易很快恢复,外国银元也重新回归主导地位。标准化程度以及流通性高的货币驱逐了交易成本较高的银两。通过南北方货币使用情况对比,可以发现南方开始流行使用银元的时候,北方依然在使用银两,而两地对铜钱使用的变化趋势则基本一致。

历史事件对货币结构变化的影响可能是年度性,甚至月度性的。如果我们将年份间隔以十年计,则完全不会看出太平天国战争对徽州货币结构的影响以及其中发生的故事,会误以为这是“风平浪静”的十年,而当我们将年份间隔细化为一年计时,则可以发现此中“波澜”。对同和号与兆成号商业账簿的整理,虽然不能说是一项庞大的工程,但是它为中国经济史数据补充了一点“砖瓦”,相信随着学界对账簿、契约文书挖掘的深入,定会使得中国经济史数据更加完善,发现并

① 熊昌锷:《近代宁波的洋银流入与货币结构》,《中国经济史研究》2017年第6期;熊昌锷:《近代福州的茶叶出口与外国银元的流入》,《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7年第4期。

② 刘小萌:《北京商业契书集》(下),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版。

解决更多问题。

作者简介:袁为鹏,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

授、博士生导师;龚达,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潘 清)